

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
编

古代长江下游的 经济开发

三秦出版社



卷之五

古今詩話

卷之五



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 编

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

吴泽题

三秦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6 号

1996.10.16.

新华书店

东城机关服务部

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

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 编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 12 号)

*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未央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9.375 印张 2 插页 223 千字

1996 年 3 月重印

ISBN 7-80546-165-1/K·63

定价:3.50 元

前 言

卞孝萱

在我国历史上，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封建王朝，习惯上称为六朝。六朝时期，南方得到开发，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是承先启后、继汉开唐的重要历史阶段。南京是六朝的首都，江苏是六朝的重要地区，拥有丰富的文献、宝贵的遗迹、大量的文物。为了促进六朝史的研究和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1985年11月在南京成立了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几年来，在党政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我会做了如下工作：

(1) 与南京市教育学院联合举办了六朝史系列讲座；

(2) 对镇江境内的六朝遗址、水道，丹阳境内的南朝陵墓，句容境内的破岗渚运河等，进行了实地考察；

(3) 编印了《六朝史论文目录》；

(4) 召开了几次学术会议。

1987年11月20日至24日我会联合有关单位在常州召开的“长江下游3——9世纪社会经济研讨会”，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区域性经济史的研讨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来自本省和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专家学者七十余人，提供论文四十余篇。有些专家因事未能到会，发来了贺电、贺函、贺诗。

与会同志以研讨长江下游3——9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主题，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水利、城镇经济等方面，并就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文化、生产关系诸因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在讨论中，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

例如：与会同志对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包括南移的原因、标志、涉及的范围、起点与过程等，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大家畅所欲言，气氛十分热烈。

这次研讨会与以往的学术会议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就是：自始至终贯彻了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相结合，为四化建设献计献策的主导思想。与会同志认为，我国区域经济的形成，有很长的历史。加强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整个经济史的认识，而且与现实有密切联系。例如：上海经济区的形成，不是偶然的、突然的，而是有其历史缘由的。研究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总结经验，可为今天提供历史借鉴。

著名历史学家吴泽教授在大会上做了重要的学术报告。与会同志在大会和小组讨论中还分别交流了论文，这些论文，观点新颖，论据充分，从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结合上进行剖析，既对古代长江下游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总结，又对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展望，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现实意义。

这里以《略论三世纪以来长江下游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原因》一文为例，作者王炎平同志在分析了历史原因以后，紧接着提出了他对今后的展望，如：

（1）3世纪以来，长江下游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其原因是：政治上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开放型的经济结构。这是宝贵的历史经验。对照中原经济屡次受到战火的摧残，其他地区经济因比较封闭而比较缺乏活力的教训，古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其意义就更不平常了。我们应从古代长江下游经济的最佳发展态势中认真总结经验，作为当前经济建设的借鉴。

（2）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与人口问题：唐以前，北人南迁加强了开发土地的生产力。宋以后，多种经营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城镇经济的发展，为农业上的剩余劳动力找到了经济上的出路，因而能够承受人口增长的压力，社会继续保持安

定，经济继续不断发展。今天，我国西部地广人稀，可借鉴长江下游唐以前发展经济的经验，从外地引进人力、资金和技术。我国东部存在着乡村人口过剩、城市容受能力有限的问题，可从长江下游宋以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种非农业经济及城镇经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我国人口问题的警钟，最先在长江下游敲响。关于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计划生育的主张，最先由江苏人冯梦龙提出。明清两朝所采取的从经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疏散人口的措施，既多少缓和了发达地区的人口压力，又帮助了落后地区的开发。这对于今天调整我国的经济和人口布局，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3）古代长江下游经济的发展，受惠于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这应引起我们重视保护生态环境。

（4）从历史上看，我国西部经济的衰退，拖住了长江下游经济前进的步伐。未来的长江下游经济，将在广泛开展与其他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中，在我国全面经济的振兴中，获得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造成古所未闻的现代化经济奇观。

像这样的写法，在以往的纯学术经济史论文中是没有的。其他论文，不多举了。

可以说，这次研讨会为区域性的经济史研究、为史学怎样服务于现实，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与会同志表示，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加强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古为今用”，为当前的四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而努力奋斗。

会后，由许辉、郭黎安、方亚光等同志选编了《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一书，奉献给读者。限于篇幅，还有许多好文章未能选入，深以为憾，请同志们谅解。

这本小书的出版，得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密切合作，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和三秦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又承吴泽教授题签，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前言	卞孝萱	(1)
北宋以前江南地区的开发过程及其在全国经济地 位的历史演变	魏嵩山	(1)
唐代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区经济发展初探	翁俊雄	(18)
南朝蛮族的分布及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开发	周伟洲	(36)
略论三世纪以来长江下游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原 因	王炎平	(54)
论东晋、南朝前期徐、扬地区经济的发展	许 辉	(67)
关于唐五代太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再认识	郑学檬	(81)
六朝隋唐时期的金陵与广陵	方亚光	(92)
唐代宣歙地区经济初探	王赛时	(103)
论唐代江南在唐帝国地位的演变	孟昭庚、张学锋	(114)
东吴屯田制述论	童 超	(128)
六朝时期江南的“墅”	田泽滨、黄正藩	(146)
论魏晋隋唐之间江淮地区水利业的发展	郭黎安	(164)
唐代淮南、江南两道的茶叶生产	李季平、王洪军	(184)
论唐代后期淮南道盐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孙永如、张连生	(195)
六朝工商业与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	简修炜、葛 壮	(204)
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发与市场的扩展	冻国栋	(222)
六朝时期京口港和商业都会的形成	石受禄	(240)

六朝时期长江下游商业的发展·····	何荣昌	(247)
盛唐以后商胡麋集扬州之由·····	刘希为	(256)
南朝三吴地区的十夫客·····	蒋福亚	(268)
唐代文风南兴及其经济原因管窥·····	袁英光、李晓路	(277)
后记·····		(292)

北宋以前江南地区的开发过程 及其在全国经济地位的历史演变

魏嵩山

今上海市和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以及安徽、江苏长江以南地区，通称江南。这里农业发达，城镇林立，工业先进，商业繁华，为我国经济发达区。江南并非自古繁盛，研究这一地区开发的过程及其在全国经济地位的历史演变，对规划当地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依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就历史地理方面对这一问题略加探讨。

(一)

马克思曾经指出：“不说社会生产形态的发展程度有大小不等，劳动生产总是和各种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那些条件，可以拢总还原为人类自身（如人种等）的自然和围绕着人类的自然。外部的自然条件，在经济方面，分为两大部类：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如土地的肥沃性和富有鱼类的水等等；劳动手段的自然富源，如涌出的瀑布，可供航行的河道、树木、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前一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作用；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则是后一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作用。”^①

本区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湿，雨量充沛，植物茂盛。全区约43.8万余平方公里，大部分为山地丘陵，平原面积较少，主要分布于河口三角洲。地下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锡等矿。这

种自然环境伴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当地的开发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得不具有自己的特点。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六千年前本地区已经有了农业。西周、春秋时期吴、越二国分别据有太湖与钱塘江流域，当地曾得到相当的开发。

战国末本区吴越故地为楚春申君黄歇封地，西汉初又为吴王刘濞领地，开发转盛。史称“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②。至东汉末，本区吴郡一带已是“沃野万里”，号为“乐土”^③。

但就全国范围而言，直到魏晋以前本区经济仍很落后。《尚书·禹贡》划全国为九州，分别记载其土地利用情况，第一至第六等分别为雍州、徐州、青州、豫州、冀州、兖州，皆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第七至第九等则分别为梁州、荊州、扬州，梁州当今四川及汉水上游一带，荊州当今湖南、湖北及南阳盆地一带，扬州则指本区所在以及今安徽、江苏淮河以南地区。《禹贡》成书于战国，由此可见当时全国土地开发以黄河流域最好而以本区最差。

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江南地区虽然气候温湿，雨多，河川径流量大，自然条件优越于北方，农作物和各种植物的生产有有利的条件，但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终年依靠采集野生植物果实和狩猎以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反而使农业的发展“不成为一个自然的必要”；加上江南地区大部分为丘陵山地，平原面积较少，主要分布于河口三角洲，为了免除洪水的威胁，人们不得不使自己的活动主要限于山区，因此给农田的开垦带来一定的困难，而给采集和狩猎却提供了便利。秦汉时期生产力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仍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及四川盆地一带，江南地区仍停留在“火耕水耨”阶段。《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全国所设铁官凡44县，负责铸造农

具，其中有36个县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丹阳、会稽、豫章三郡所在江南地区竟无一县设有铁官。故汉司马迁述及当时经济区域时说：“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鱼羹，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皆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以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④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黄河流域战争频繁，人口大量南移，使先进生产技术在江南地区逐渐得到传播，进而促进了本区的开发。但据统计，此时本区户数反较两汉时期减少^⑤。究其原因固然史籍记载或有不实，但最重要的当是由于世家大族的发展，大批农民多依附于豪门之下，他们没有独立的户籍所致。以刘宋大明八年为例，虽然当时户数较两汉为少，但口数却为240,0758万口，平均每户达6.45口，皆远远超过两汉；西汉时本区平均每户不过4.50口，东汉时本区平均每户只有4.19口，此正可用以说明当时豪门占有农民之数众多。

三国分立，本区地属孙吴。晋陆机《辩亡论》谓吴“其土沃，其民练，其财丰，其器利”⑥，左思《吴都赋》又称“其四野则畎畷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由此足见当时开发之盛。孙吴时大兴屯田，分别置典农校尉于毗陵（今江苏常州市），典农都尉于湖熟（今江苏江宁县湖熟镇）、江乘（今江苏句容县北）。屯田都尉于溧阳（今江苏高淳县东），督农校尉于于湖（今安徽当涂县），屯田校尉于海昌（今浙江宁海县盐官镇）。其中毗陵典农校尉辖有今江苏无锡、江阴、武进、丹徒、丹阳等县地，规模最大，拥有屯民“男女各数万口”。永安三年（260年）又采纳严密的建议，于今当涂县南境“建丹相湖田，作甫里塘”⑦，虽因工程浩大，未能成功，但为后代围湖

为田创造了经验。孙吴造船业非常发达，著名造船中心分布于本区的有建安（今福建建瓯县）、原丰（今福建福州市）、温麻（今福建霞浦县西）等。

至东晋南朝时期，本区有了进一步的开发。《宋书·孔季恭传》称：“江南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山傍海，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范泰传》又称：“今之吴、会，宁过二汉关、河”。同样，与吴、会稽二郡毗邻的吴兴郡亦为当时“奥区”，“地沃民阜，一岁称稔，则穰被京邑”^⑧。故南齐萧子良说：“三吴内地，国之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⑨关中本秦汉政治中心所在，经济繁荣，而居全国之冠。而东晋南朝时三吴所在今太湖流域与钱塘江下游一带经济发展居然超过秦汉关中地区，足见其开发之盛。在姑孰所在今安徽当涂县一带，《陈书·宣帝纪》载：“姑孰饶旷，……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薨，阡陌如绣。”刘宋雷次宗《豫章记》又载今江西地区：“地方千里，水陆四通，……奇异珍货，此焉是出；奥区神皋，处处有之。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金铁篠簜，资给于四境。沃野垦辟，家给人足，畜藏无缺。故穰岁则供商旅之求，饥年不告臧孙之采。”^⑩今南昌市城西赣江西岸一带良田尤多，“极膏腴者，一亩二十斛”^⑪。今吉安市一带，农业亦有很大发展。陈刘竺为庐陵太守，于此“勉人农桑，……公家无负担，私室有余粟”^⑫。

东晋南朝本区农业所以得到较大发展，与水利的兴修分不开，还在西晋末陈敏“据有江东，务修耕绩，令弟潜遏马林溪水以溉云阳（今江苏丹阳县），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⑬东晋时张闾为晋末内史，又于曲阿（今丹阳县）北立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孔愉为会稽内史，于句章县（今浙江慈溪县东南城山

渡)境修复汉时旧陂堰,溉田二百余顷。南朝刘宋末于乌程县(今浙江湖州市)境筑成吴兴塘,溉田二千余顷;齐沈瑀于今江苏句容县筑赤山塘,立石闸启闭,发展灌溉;梁时又于今浙江仙居县“堰谷为六陂以溉田”^①。由于黄河流域人口大量南来,三吴地区开始出现地狭人稠的现象,于是又围湖为田:东晋殷康为吴兴太守,筑荻塘。西起今浙江湖州市,东抵今江苏吴江县平望镇,“围田千余顷”;刘宋孔灵符又以“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市)土境褊狭,民多田少”,“表徙无赘之家于余姚、鄞(今浙江奉化县东)鄞(今浙江宁波市东)三县界,垦起湖田,……并成良业”^②。山阴县城东有回踵湖,始宁县(今浙江嵊县北)境有怀噎湖,谢灵运欲霸为私有,求“决以为田”,只是由于受到当时会稽内史孔颢反对,结果未能实现。

本来菽、麦等旱作物和桑、麻在本区很少种植,即东汉刘殷所谓“今滨江湖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③。随着黄河流域人口的大量迁入,这时也逐步得到推广。东晋太元元年(376年)曾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爇地投秋下种。”^④又刘宋元嘉二十一年(444年)诏:“比年谷稼伤损,淫元成灾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尽。南徐、兖徐及扬州、浙江、江西属郡,自今悉督种麦,以助阙乏。”^⑤大明七年(463年)复诏:“今二麦未晚,甘泽频降,可下东郡境,劝课垦殖;尤弊之家,量贷麦种。”^⑥随着菽、麦的逐步种植,蚕桑亦得到相应的发展。“今浙江温江一带,据《永嘉记》载蚕一年八熟;今江西地区,《隋书·地理志》载其地“蚕一年四五熟”,男子勤于耕稼,女子“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本来江南无织锦业,所谓“江南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特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⑦。及刘裕灭后秦,迁关中锦工于江南,于建康城内建斗场锦署。从此织锦业亦在本区得到了发展。梁沈瑀永泰中任建德(今浙江建德县东旧建道)令,教民种

桑及柿、梨、栗，“顷之成林”^②。由于蚕桑的发展，绢布产量增加。南齐萧子良称：“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于今，……渐及元嘉，物价转贱。”^③

矿冶生产在此时亦有很大发展。最著名的有梅根冶，在今安徽铜陵市西南。又有东冶在建康城内。此外“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④。

随着本区的日渐开发，大量城市相继兴起。据统计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本区共有141县，已较两汉大大增加，刘宋大明八年（464年）本区更增加到219县，隋初经过调整，至大业五年（609年）减为73县，但仍然超过两汉之数。其中建业，乃孙吴、东晋南朝所都，城北据长江，商业发达，市场繁荣，为江南第一大城，自孙吴以来扬州及丹阳郡（刘宋以后称丹阳尹）皆治于此，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⑤。平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⑥。梁时“城中二十八万户，东西南北各四十里”^⑦。有大市四：“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城市也。”^⑧此外沿秦淮河北岸更有“小市十余所”，“市廛列肆，埒于二京”。^⑨京口即江苏镇江市，地当江南运河入长江之口，孙吴初都于此，刘宋以来又为南徐州治。《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六年（449年）诏称：“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衿带江山，表里华甸，经途四达，利尽淮海，城邑高明，风土淳一，苞总形胜，实唯名郡。”此外宣城（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城县）、毗陵（郡治晋陵，今江苏常州市）、吴郡（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会稽（郡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余杭（郡治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东阳（郡治金华，今浙江金华县）诸郡，亦“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⑩。尤其是会稽郡治山阴，号为“民户三万，海内剧邑”，“商旅往来，倍多常岁”^⑪。

但《隋书·地理志》载各地风俗却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同书《食货志》亦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积聚”。此竟与《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情况基本相同。如果据此以为隋时本区经济发展依然停留在秦汉的水平上，显然是不符事实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当时江南各地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某些地区尚很少开发。如今福建漳州地区，唐吴与《漳州图经序》载其州于垂拱二年（686年）始割福州西南地置，“寻以地漳疠，吏民苦之”，不得不于开元四年（716年）、兴元二年（785年）两次迁治。

（三）

本区的开发至唐代逐步走向高潮。在农业生产中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更加普及。陆龟蒙《耒耜经》载江东犁共分十一个部件，深耕浅耕自如。《新唐书·钱徽传》载江州“有牛田钱百万，刺史以给宴饮赠饷者。徽曰此农耕之畜，可用他哉？命贷贫民租入”。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唐代前期本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唐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本区属江南道东部。据统计贞观十三年全国共1408县，304.1871万户，1235.1681万口^①，其中本区有80县，31.497万户，153.6625万口，虽较隋大业五年有所增长，但占全国比例甚微，绝大多数县与户口则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至天宝元年（742年）本区县及户口有了大幅度增长，较贞观十三年县数增长80%，为144县；户数增长4.85倍，为150.95201万户；口数增长更达6倍以上，凡942.6328万口。当时全国为十五道，共有1570县，897.364万户，5097.5543万口^②，本区县占总数9.17%，户口分别占总数的16.82%和18.49%，仍

然在黄河中下游河南道、河北道之下。《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前期全国所修农田水利工程凡163项，其中本区计22项，占总数13.5%，又《通典》卷12《食货》载天宝八年全国诸道正仓储粮凡1616.74万石，其中本区所在江南道共为97.8825万石，仅占总数6.1%，居全国第五位。全国诸道义仓储粮凡6323.763万石，其中本区所在江南道共为673.927万石，占总数10.7%，居全国第四位。《唐六典·少府寺》载全国丝织品生产，按其质量分为八等，其中一至四等全分布于黄河下游诸州，本区只有建（州治建安，今福建建瓯县）、泉（州治晋江，今福建泉州市）、福（州治闽县，今福建福州市）三州出产，而质量列为第八等。

安史乱后，由于黄河流域再次受到战争的破坏，江南地区相对处于安定的环境，本区经济发展才逐渐赶上黄河中下游地区。

《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后期全国共修农田水利工程101项，其中江南道即达49项，除1项分布于鄂州永兴县（今湖北阳新县）外，其余全部分布于本区，占总数48.5%，已居全国诸道之首。由于水利开发，耕地面积大增。但《元和郡县志》卷25载润州领户为5.54万，垦田为6727顷，平均每户垦田12.11亩；浙西观察使所领润、常、苏、杭、湖、睦六州管户37.3772万，垦田57932顷，平均每户垦田达15.50亩。而当时本区共有80.2494万户，如以每户平均垦田12.11亩计，则本区垦田不过9782顷；如以每户平均垦田15.5亩计，本区垦田也只有12.4387万顷，此显然与实际情形不符。《新唐书·地理志》载大历十二年（777年）王昕修句容县绎岩湖，又名赤山湖，“开田万顷”，句容县其时为润州所领六县之一，《元和郡县志》所载润州垦田数竟不及句容县赤山湖附近垦田之数，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元和时本区较天宝元年新增21县，加上原有之县共156县，姑以每县垦田平均一万顷计，则本区应有垦田约150万顷许，才能较符合实际。因为开元二十八年全国共841.2871万户，应授田为1440.3862万顷，平均每户应